

商人与文化的 双重变奏

徽商与宗族社会
的历史考察

唐力行 著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48

《东方商旅》丛书编委会

主编：严昌洪

编委会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朱 英 严昌洪 余东升 陈 钧
唐力行 葛贤慧

内 容 简 介

徽商是明清直至民国初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商帮，它所拥有的资本是同期西欧商人所难望项背的。在徽州，宗族、商业、文化三者互动互补，构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系统。本书从社会文化变迁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徽州宗族社会的形成及其结构变迁；从文化学的角度，探讨了宗族文化、商人文化对徽商及徽州社会的影响；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了宗法制度与社会生活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从商品经济发展的角度，探讨了宗法制度在徽商经营活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研究了以宗族文化为核心的新安文化的双重作用以及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

古老的徽州府，山（黄山）之凝固，水（新安江、闽江）之灵动，从这里走出的“徽骆驼”创造了世界商业史上的奇迹。

序《东方商旅丛书》

章 开 沅

说“商人是人”，难免会引起公孙龙的传人们逻辑方面的非议；比较稳妥的说法为“商人也是人”，这样便无懈可击。

作为“也是人”的商人，在中国大地上存在已久，但其传统的社会地位却相当低下。“士农工商”，商为四民之末，经商则被贬之为末业。但在农业宗法社会，四民各有其特定的分工与职能，商虽位居其末，却又未能缺少，并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日渐趋于显要。作为非商的其他三民，特别是以社会正义代表自居的士，羡慕商的财富却又鄙薄其心术与行为。因此，在中国的文字记载中，商人大多与奸伪狡诈、奢靡挥霍相伴随，可圈可点的丰功伟绩并非甚多。

及至晚清，由于国门被迫开放与社会转型，人们的观念逐渐有所变化，重商主义与商战之论言者日多，商人的角色和形象都在明显提升。特别是到了20世纪初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和商会的建立，中国商人的地位与作用更显重要。

1906年秋，章太炎发表于《民报》第8号的《革命之道德》一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观念上的变化。他按职业把社会成员分成16种人，并且认为“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章太炎当时虽热衷于倡导国粹主义，但在这篇流传甚广的文章中却颇能因应时势，改变了传统的四民序列。他按职业与道德两重标准厘订的序列是：“一曰农人，二曰工人，三曰婢贩，四曰坐贾，五曰学究，六曰艺士，七曰通人，八曰行伍，九曰胥徒，十曰幕客，十一曰职商，十二曰京朝官，十三曰方面官，十四曰军官，十五曰

差除官，十六曰雇译人。”商人从四民之末，一跃而为仅次于道德高尚、辛勤劳动的农民和工人，并且位列于三种士人（学究、艺士、通人）之前。他对商贾的评论亦颇平实：“裨贩者，有二种，其有荷簪戴盆，求鬻于市者，则往往与农工相类。若夫千里求珍，牵车载牛，终日辘重不离身，其人涉历既多，所至悉其民情谣俗，山谷陵阪之间，有成心于暴客，则亦习拳勇，如击刺，其高者乃往往有游侠之风，恤贫好施，金钱飞洒，然俾张为幻之事，亦稍以益多矣。坐贾者，倚市廛，居奇货，其朴质不逮农工，其豁达不逮裨贩。以蓄为宝，以得为期，然不数恣为奸利，愚迂有无，心济以信，其有作伪罔利者，取济一时，久亦无以自立，此则贾人自然之法式也。”中国传统商人以诚信闻名于世，但这一职业道德的形成必定经过漫长的岁月，以假冒伪劣谋取暴利可以得逞于一时，却无法取信顾客于长久。要从主客观两方面促成商人的道德自律，市场才能从无序走向有序，此即大炎所谓“贾人自然之法式也”。

此文值得推敲之处倒是作者对职商的评估。职商亦称绅商，实为商人之上层，且多为民族近代工商大企业的创始者。章氏列之为十一等，并且评估说：“职商者，非谓授例纳捐，得一虚爵，谓其建设商会，自成团体。或有开矿筑路通航制器，直隶于商部者。自满洲政府贪求无度，尊奖市儈，得其欢心，而商人亦自以为最贵，所至阻挠吏治，掣曳政权。已有欺罔赃私之事，长吏诤问，则直达商部以解之；里巷细民，小与己忤，则喊使法吏以治之。财力相君，权倾督抚，官吏之贪污妄杀者不问，而得罪商人者必毙；氓庶之作奸犯科者无罚，而有害路矿者必诛。上无代议监督之益，下夺编户齐民之利。或名纺纱织布而铸私钱，或托华族寓居而储铅弹，斯乃所谓大盗不操戈矛者。若夫淫佚燕报，所在有之，则不足论也已。”

读者不难看出，大炎当时已是革命家，所以他标榜的“革命之道德”实以政治判断为前提。同时，他又是一个文明悲观主义

者，认为道德（善）并非与文明俱进，而恶行倒是与文明俱增。所以此文明明确指出：“要之知识愈进，权位愈申，则高于道德也愈远。”农人劳苦而又未经开化，平时畏服官府，但如对之追求无度，也会起而为变，视死如归。工人虽略开化而稍知诈伪，“然其强毅不屈，亦与农人无异。”农工勤劳朴实，受压迫最深，反抗性最强，是革命的基本动力，因此被认定为道德序列的前端。婢贩、坐贾虽然朴质不逮农工，但与农工近而离官府远，可以作为争取的革命助力，因此在道德序列上仅次于农工而位于士人之前。至于通士以上，由于知识愈进，接近官府甚至进入官府，很难支持革命甚至公然反对革命，所以“离于道德也愈远”。也正因为如此，作为上层的职商，由于得到清政府的扶植与培育并且维护固有统治秩序，便被认定为道德序列之第十一，仅略先于京朝官与方面官，堪称“准革命对象”。

章太炎的16等道德“等次”的划分，如果从革命策略层次着眼，颇有点近乎此后30多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格局。但他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显然是从《周礼·天官·大宰》“六曰商贾”之类言词得到启发。他对进化论已持怀疑态度，更没有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价值判断的第一优先。因此，他对活跃于清末民初且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起过积极作用的绅商的评判，就难免失之于偏颇。在太炎思想深处仍然存在着传统士大夫的重义轻利、重农轻商情绪。

其实，作为从士大夫转化为绅商的那一代创业者，内心深处又何尝没有轻商情绪。以状元下海而名噪一时的张謇，就曾把自己这一转化说成是：“以儒然自恃之身，濯秽浊不伦之俗。”即使已经成为大生资本集团领导人之后，他仍然没有舍弃传统道德理念。譬如，他对于金钱政治就极为憎恶。1921年他曾致函友人抨击时政说：“仆思议会之睡眼久矣，此孽自项城（袁世凯）造之，而致项城之造此孽者又有人在。其故皆由于浮慕吹风，一若议会之有政党，政党之用金钱魔力，彼固有之。不知施于我国曾无一

致常识之人士，乃通得其弊。予金钱者，窃国而不止侯；受金钱者，窃钩而不胜诛。风狱雷颠，波谲云诡。雷轰池之顽窍，荡廉耻为灰尘，愈演愈奇，至有今日。”张謇的语言饱含悲愤，也相当平实。当时的中国商人，实力虽有所增长，但远远还不足以玩金钱（权）政治游戏，以金钱予受操纵政治者主要还是统治者本身，这与现今台湾地区的金权政治又有所区别。

中国商人虽然在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总的来说还是生不逢辰，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处境艰窘，市场与群体都未发育成熟。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虽曾考虑过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在较长时间内存在并在一定条件下适当发展，但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架已经预先确定要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并且要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而把资本家个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58年以后，由于“左”倾思潮的日益泛滥，某些社会主义的设计师们甚至连市场经济也看作势必消除的异端，计划经济遂成为统驭全部社会生活的神圣模式。其灾难性的结果早已彰显，但我们则迟至70年代末才开始醒悟，原来“士农工商”的四民也好，或是“工农兵学商”的五民也好，都是缺一不可，各有其特定而又必需的角色与功能。固然这并非历史循环论的回归原地，人们宁可理解为螺旋式地向社会更高阶段发展，但时间毕竟已损失20年左右。何况，从大一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刻变革，我们还没有任何更为卓有成效的先例可以仿行，一切都得靠自己不断探索与创造。

不过，也不能说我们自己的历史就丝毫不能提供借鉴，中国近代商人本来就是中西经济文化交会、冲突、融合的产物。历史条件虽然早已时过境迁，但中国商人（包括传统商人与近代商人）所走过的漫长而艰难的道路，其中确有许多经验教训可供后世参考。而且，作为也是人的商人，其聪明智慧并不低于其他职业人等，特别是他们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更是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

写到这里，我偶然想到航运企业家卢作孚在30年代发表的一篇短文《麻雀牌的哲理》，现照录如下：

几块麻雀牌儿，何以会使乡村以至都市的人，下层社会以至上层社会的人，无论男女老幼皆喜欢它，亲近它？这有一个很简单的答复，便是搓麻雀已经成功了一个坚强的社会组织，在这个社会的组织当中，有它底中心兴趣，足以吸引人群，足以维持久远而不致于崩溃。

搓麻雀是在一个社会组织当中作四个运动：用编制和选择的方法，合于秩序的录用，不合于秩序的淘汰。把一手七零八落漫无头绪的麻雀局面，建设成功一种秩序，是第一个运动。全社会的人总动员加入比赛，看谁先建设成功，看谁建设得最好，是第二个运动。到一个人先将秩序建设成功时，失败者全体奖励成功者，是第三个运动。去年偶同黄任之（炎培）先生谈到此段哲理，他还补充了一点，就是：失败了不灰心，重振旗鼓再来，这是第四个运动。这样的哲理，实值得介绍与国人，移用到建设社会、建设国家的秩序上去，也许一样可以吸引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人的兴趣于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的建设上去。

（载于《新世界》第50期，1934年7月16日）

卢作孚当然无意于提倡全体国人都来学点哲学，但他通过打麻将因小见大，领悟出建设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的重要与运动（游戏）规则，其头脑的精明与洞察之深刻确有过人之处。联想到此文发表四年以后，由于武汉失守民生公司不得不承担长江上游90%的航运任务。当时支前和后撤两重任务同时吃紧，大量西迁人员与10余万吨器材积压于宜昌，并且遭受日机狂轰滥炸。卢作孚作为民生公司总经理，同时又是接任不久的交通部次长，毅然受命于国家危难之际，冒着生命危险亲赴宜昌指挥，经过40天昼夜奋战，终于在宜昌沦陷前夕，将全部西迁人员和物资抢运入川，

而民生公司的船只与员工也遭到很大损失。中外誉之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克尔克”。可以想见，卢作孚当年的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其气概与风采也不会略逊于一军之统帅。可惜这一代中国商人的精英分子，在1949年以后长期未能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及至我们醒悟以后的改革开放，他们或者早已离开人间，或者迅即进入衰暮之年，人生的黄金时段一去不返。这不仅是他们个人或群体的重大损失，也是国家和社会的重大损失，只能说是时也，命也！但他们留下的业绩和风范都是永远值得后世尊重与传承的。

正是有鉴于此，严昌洪教授主编《东方商旅丛书》，以商人与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着重探讨中国商业文化中传统与现代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和融合的经验 and 规律。这套丛书第一批出版者内容涉及到徽商、晋商、沪商、南洋侨商、潮汕商人、汉商和中国商事习惯等。可以看出，作为区域研究的布局，已涵盖了沿海与内地、南方与北方、国内与海外，大体上可以看出中国商旅文化和中国商人群体的整个轮廓。作者队伍以历史学者为主，他们既注意历史学与文化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结合，又努力突显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衔接，并且力求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当然，出版物的价值与品位应该由读者自己来评判，无需我提前多发议论。

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还远远没有完成，新一代中国商人的崛起和市场发育一样，在某种意义上讲仍然处于初级的甚至或多或少无序的阶段。商界人士每多诟病于投资经营环境的不够完善，却不甚强调中国商人的自我修养与品位提升，很多人还谈不上遵循“贾人自然之法式”的自觉。对于目前社会腐败和贪污腐化现象，中国商界亦应承担相当的责任。正如这套丛书所显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地位的提高，商业文化对全民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为了优化当前的商业文化，首要的任务是努力提高商人自身的伦理素质与文化品位。至少，当代中国商人的精英层应该显示更高

的精神境界与文化风貌。《新华字典》解释说：“商人就是做买卖的人。”做买卖当然要赚钱，但赚钱毕竟要遵守游戏规则，而且这并非人生的唯一目的。财富不一定会给财富所有者带来幸福，有时或许会带来痛苦，带来灾祸，甚至贻害子孙。关键是商亦有道，有其固有的伦理与规则，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历史的殷鉴多矣哉！我希望有更多的商界人士阅读此书，增长智慧，知所抉择，迅速成长为活跃于中国乃至世界市场的明星。我也希望有更多商界以外的人士阅读此书，了解中国商旅的过去，对照中国商旅的现在，与商界人士一起营造中国美好的经济腾飞的未来。

1996年初夏于桂子山新居

目 录

序《东方商旅丛书》	章开沅 (1)
-----------------	---------

第一章 社会文化变迁与徽商的形成	(1)
------------------------	-----

一、从山沟里走出来的徽骆驼	(1)
---------------------	-----

1. 山沟沟里的移民社会	(1)
--------------------	-----

2. 从中原士族到徽州望族	(6)
---------------------	-----

3. 背负新安文化的徽骆驼	(12)
---------------------	------

二、以商业为“功名”的徽州商帮	(16)
-----------------------	------

1. 徽商在竞争中成帮	(16)
-------------------	------

2. 业贾也是“功名”，“等于勋阀”	(20)
--------------------------	------

第二章 贾而好儒的徽商	(26)
-------------------	------

一、集儒贾于一体的望族	(26)
-------------------	------

二、贾与儒的良性循环	(31)
------------------	------

三、集儒贾于一身的徽商	(35)
-------------------	------

1. 虽不服儒服，翩翩有士君子风焉	(36)
-------------------------	------

2. 精于“治生之学”	(40)
-------------------	------

3. 以儒术饬贾事	(42)
-----------------	------

第三章 徽商与宗族文化	(45)
-------------------	------

一、挑着宗谱逃难的徽商	(45)
-------------------	------

二、宗族文化的内涵	(47)
-----------------	------

三、宗族文化与徽商的经营活动	(50)
1. 依托宗族势力, 获取资金和人力上的支持	(50)
2. 利用宗族势力, 建立商业垄断	(51)
3. 强化宗族势力, 展开商业竞争	(52)
4. 借助宗法制度, 控制从商伙计	(54)
5. 联结宗族势力, 组成徽州商帮	(56)
四、徽商与宗族文化建设	(62)
1. 创业、守业都离不开宗族文化	(62)
2. 把祠堂搬到侨居地去	(64)
3. 在家乡造了 6000 座祠堂	(66)

第四章 徽商与社会风尚

一、明清之际社会风尚之改观	(76)
二、徽商与“乌纱帽”	(78)
1. 官商合流的广度与深度	(78)
2. 官商合流对社会风尚的影响	(88)
三、徽商与“红绣鞋”	(101)
1. 为“红绣鞋”挥金如上的徽商	(101)
2. “新安节烈最多”与“妒妇比屋可封”	(104)
四、大宗族与小家庭的新结构	(123)
1. 徽商与大宗族、小家庭	(123)
2. 徽商与争讼之风	(127)

第五章 徽商与商人文化

一、徽州商人文化的形成	(129)
二、商人文化的通俗性	(136)
1. 徽商与江湖诗	(136)
2. 徽商与牌匾楹联	(143)
3. 徽商与小说	(154)

4. 徽商与戏剧	(158)
三、商人文化的实用性	(164)
1. 徽商与广告文化	(164)
2. 徽商与商业道德	(166)
3. 徽商与科学技术	(177)
4. 徽商与宗教信仰	(179)
 第六章 徽商与中国近世社会的转型	(184)
一、商人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	(184)
1. 最先出洋闯世界的徽商——汪直	(187)
2. 最先睁眼看世界的徽商——汪翼沧	(193)
二、徽商与社会转型	(200)
1. 从传统商人到新型资本家	(201)
2. 从忠君爱国到反对帝制建立民国	(206)
三、尾声	(213)
 后记	(220)

第一章

社会文化变迁与徽商的形成

一、从山沟里走出来的徽骆驼

1. 山沟沟里的移民社会

在安徽省的南端，有一片万山攒动、云遮雾障的土地。秀丽的新安江和阊江将她与浙江、江西相沟连。这就是古老的徽州府。她由歙县、休宁、绩溪、祁门、黟县和婺源六个县组成，府治便在歙县。千百年来，徽州以“商贾之乡”著称于世。徽州人“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①“业贾者什七八”。^②“虽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③明代中叶，徽商开始称雄于商界。在众多的商帮中，堪与其比肩的只有晋商。迨至清代则由徽商独掌中国商界之牛耳。

徽商拥有巨额的资金。万历《歙志·货殖》说：“姑论吾邑，千金之子比比而是，上之而巨万矣，又上之而十万、百万矣。”

徽商以经营盐、典、茶、木为大宗，其所营可谓“无业不

① 《二刻拍案惊奇》，卷三七。

② 汪道昆：《太函集》，卷十六，《阜成篇》。

③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一，《赠程君五十叙》。

居”。

徽商足迹遍天下。长江中下游区域向有“无徽不成镇”之谚。《休宁县志·风俗》指出，徽商“藉怀轻赀，遍游都会，因地有无，以通贸易，视其丰歉，以计屈伸。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宇内”。徽商还走出国门，交通海外，经营于日本、东南亚和欧美。

著名徽籍学者胡适曾把徽商喻之为徽骆驼，把徽商刻苦耐劳、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赞之为徽骆驼精神。这些从山沟里走出来的徽骆驼，为什么能在变幻莫测、杀机四伏的商海中，创造出辉煌的业绩？是什么造就了名震遐迩的徽商？

有人说，这是因为徽州的风水好，“盖由山川雄厚，奇特之气，磅礴郁积而钟之于人”，^①所谓地灵人杰。徽州山水灵秀，黄山山脉自东北向西南横贯全境。天目山、九华山间于其中。有“山水画廊”之称的新安江，就像一条碧玉罗带萦回于青山之间。戏剧家汤显祖曾有诗云：“欲识金银气，须从黄（山）白（岳）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黄山峰峦奇特，气脉雄厚，江南之名山也。”^②与黄山遥遥相望的白岳（齐云山）则为江南著名的道教圣地，曾被誉为“江南第一山”。诗中道出了汤显祖以及世人对徽州山水的无限向往。徽籍教育家陶行知说：“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和它相类，这个地方就是瑞士。”

也有人认为徽州山水虽好，却不利民生。《丰南志》的作者吴吉祐说：“新安多名山，少甫田沃壤，输轭钟釜，粟皆外至。”康熙《徽州府志·风俗》说：“徽之山大抵居十之五，民鲜田畴。”因此，就农业而言，徽州的山水又成了穷山恶水。《歙风俗礼教考》悲叹：“农力最为勤苦，缘地势陵绝，厥土骀刚而不化。水湍急，渚蓄易枯，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雨骤涨，而粪壤之苗又荡然矣。大山之所落，力垦为田，层累而上，十余级不盈一亩。刀耕火种，望

① ② 《丰南志》，第7册，《读新安吴氏诗文存书后》。

收成于万一。深山穷民，仰给杂粮。早出皆耕于山，耦樵于林，以警狼虎；暮则相与荷锄负薪以归。精馐华服，毕生不一遵焉。”正是徽州的山把徽州人逼上了经商的路。明嘉靖年间徽州一村妇说：“吾郡在山谷，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①商人们也如是说：“吾徽居万山环绕中，川谷崎岖，峰峦掩映，山多而地少。遇山川平衍处，人民即聚族居之。以人口孳乳故，徽地所产之食料，不足供徽地所居之人口，于是经商之事业起，牵车牛远服贾，今日徽贾之足迹，殆将遍于国中。夫商人离其世守之庐墓，别其亲爱之家庭，奔走四方，靡有定处者，乃因生计所迫。”^②

上述两说，虽有不同，但都将徽商的起源归之于徽州多山的地貌。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如果深一层地问：东南一带多山的区域甚多，为什么那些地区出不了徽商一样强大的商帮？显然仅据以上两说是无法解说清楚的。我们不仅要注意到地理与民生的关系，还应深入考察地理与文化的关系。即便就地理而言，也不仅要注意到徽州内在的多山，还要注意到徽州在江南的地理位置。这样，才有可能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去把握徽州特定的地理环境与徽州特定的文化——新安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而从文化的层面上去揭示徽商勃兴的原因。

徽州多山，“州在万山中”，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东有大鄣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阨”。^③“其险阻四塞几类蜀之剑阁矣，而僻在一隅，用武者莫之顾，中世以来兵燹鲜焉”。^④被群山封锁与外界隔绝的徽州就成为避乱的理想世界。根据明刻本《新安名族志》的记载，最早迁入徽州的是方、汪两姓。方氏迁徙江南的背景是西汉末的社会动乱。当时在汉廷任司马长史的方纁“因王莽篡乱，避居江左，遂家丹阳，

① 汪道昆：《太函集》，卷四十五，《明处士江次公墓志铭》。

② 吴日法：《徽商便览·缘起》。

③ 道光《徽州府志》，卷一，《地理·形势》。

④ 方弘静：《方氏家谱序》。

丹阳昔为歙之东乡，今属严州，是为徽严二州之共祖也”。^①汪氏迁徙江南的背景则是东汉末的社会动乱。“汉灵帝中平间，曰（汪）文和以破黄巾功为龙骧将军。建安二年，因中原大乱南渡江，孙策表授会稽令，遂家于歙，是为新安汪氏始迁之祖”。^②秦汉之际，徽州属古荒服之地，其居民为“椎髻鸟语”的山越。山越人发挽独髻，操着汉人听不懂的像鸟声一样的语言。随着汉人的南迁，江南的开发，山越人与汉人的矛盾激化起来。三国时徽地属吴国。山越“依阻山险，不纳王租”，^③“以材力保捍乡土”，^④对抗孙吴政权。孙吴与山越进行了几十年的战争。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部将贺齐平定山越，歙县被析为始新、新定、黎阳、休阳四县，连同歙、黟共六县，立为新都郡，这是徽州立郡之始。从此，开始了汉文化与山越文化融合的过程。

徽州是个移民社会。避乱是移民的第一位原因。此外，还有官于徽州，爱其山水清淑，定居下来的。例如鲍氏，其先居于青州（今属山东），晋“永嘉末，青州大乱，子孙避兵江南”。东晋“咸和间，曰（鲍）弘任新安郡守，因占籍郡城西门”。^⑤又如任氏，其先居于乐安博昌（今属山东）。梁天监中，任昉“出守新安。尝行春，爱富资山水之胜，遂家焉。后名其居曰昉村，昉溪。”^⑥徽州的大好山水加之闭锁的环境，成了乱世避难、治世隐居的世外桃源。黟县人至今仍自称为是“桃花源里人家”。《方輿胜览》载道：“樵贵谷，在（黟）县北，昔土人入山，行七日，至一穴，豁然，周三十里，中有十余家，云是秦人，入此避地。”“一穴”即黟县“桃源洞”，为南向进入黟县的必经道口。据说黟县就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记》的原型。陶氏一脉至今仍生活在黟县。据《陶氏宗谱》载，五柳先生陶渊明乃其五世祖，至今已传至六十六世了。其三十五世祖庚世公为避元代战乱始迁黟县淋漓山下，谱中载有

①②③④ 程尚宽：《新安名族志》前卷，第32、55、71、169页。

⑤ 《资治通鉴》卷五六，胡三省注。

⑥ 罗愿：《新安志》，卷一，《风俗》。